

# 超文本多语式的社会符号学分析<sup>\*</sup>

北京交通大学 叶起昌

**提要:** 本文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超文本的多语式,包括多语式的社会符号学论述、视觉语篇空间的划分、表征世界的事态阐释以及观察者与图像之间的社会关系阐述。实例选自人民网。

**关键词:** 超文本、社会符号学、多语式、视觉化、设计资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06)06-0437-6

## 1. 语式和多语式

在表征和交流方面,交流渠道与媒介的多样性和文化与语言的多元性是当代话语的两大显著趋势。这两大趋势不断改变着工作场所、公共场合和个人生活这三大生存空间,也使语篇的体现更具多语式(multimodal)特征。在该语境下,理解多语式语篇无疑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

语式(mode)指交流所采用的信道。除口笔头媒介之外,语式还包括诸多细节性选择(Halliday 1978/2001: 33)。多语式并不是新问题,因为语篇从一开始就不是单语式的。例如语篇以笔语为媒介,采用什么书写材料、字体、颜色等就是上述的“细节性选择”,它们同样参与意义的形成。若语篇以口语为媒介,那么,抑、扬、顿、挫,是说还是唱等也是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往的话语分析大多将这些“细枝末节”作为预设前提。而超文本(hypertext)不但在使文本从印刷语篇转变为视觉表征的过程中起到极端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将这些细节带到话语阐释的突出位置(见例1)。因此,应该从什么角度和如何综合分析同一语篇中主要语式的不同意义就构成本文讨论的焦点。分析的实例来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 2. 超文本与话语视觉化

Nelson 于1967年创造了“超文本”一词,指非线性

的显示和书写,并将其定义为“利用计算机的功能将自然语言文本与非线性文本结合,进行交互分枝或动态显示”(转引自 Ramarapu et al. 1999: 77)。

超文本是结构文本,由超链接(hyperlink)和接点(node)组成,接点就是文本。文本包含少量的信息或整个文件,因而具有不同的信息量。两个文本可“链接”在一起,链接源和链接的终点可以是一个“接点”,也可以是接点中的某个词或短语,读者可跟着链接浏览文件。超文本的具体应用则称为“超媒体”(hypermedia)。超媒体除文字文本外还包含其他符号模式。本文对上述两者不做区别。在例1的整体布局(layout)中,语式不单只有文字,还包括图片、色彩、动感等。在技术上,不同语式都处在同一层面。除隐藏在超文本背后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简称html)之外,各种语式的关联还利用索引(index)、主题(theme)和标题(caption)等手段,从而构成整个引导界面(guide interface),也是超文本局部粘联的起点。引导界面的作用在于为使用者有目的地或有效地浏览网页和搜集数据提供向导(Oren et al. 1990)。当代话语具有市场化、技术化、口语化、商品化、全球化等特征,而视觉化(visualisation)则是这些特征的基础和充分发展的催化剂。因此,网络话语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多语式与视觉化。这两大特征证明了 Foucault 的下述看法无疑是正确的。Foucault (1981:143;1984:109)曾经

\* 本文承蒙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悉心指导,特致谢意。

指出,在任何社会,话语的生产无一例外地按照一定数量的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包括外部控制、内部规则和评估知识)就是话语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它们主宰着当代社会的内在实践。Fairclough(1992:215-218; 1995:103; 1996:73)用社会的话语实践(the discourse practices of a society)来指话

语秩序。话语秩序或社会的话语实践在超文本中典型地体现为有效性和适合度。有效性指绝大部分信息以图像的形式传送要比言语语式来得更有效;适合度则是绝大多数类型的信息更适合以图像形式来表达,而不是言语形式。超文本在这个意义上是网络话语的代名词。

### 例 1.



(2003年5月26日拷贝)

多语式特征意味着网页设计者可依据界面的不同位置选择不同的设计资源。设计资源(design resources)(The London New Group, 2000)可以是语言成份,如词汇、隐喻、情态、及物性、信息结构、局部和全局粘联等;可以是视觉因素,如颜色、视角、向量、前突和背景等;可以是姿态设计,如躯体的或物理的行为、手势和感官等;也可以是空间设计,如生态系统、地理意义和建筑意义。听觉方面则包括音乐和声音效果。

在话语分析领域,对上述两大特征予以较多关注的学科是社会符号学。

### 3. 社会符号学与交流的三大条件

Halliday & Hasan (1989: 3)主张,“社会符号学”可看作是意识形态或学科的概念视角。从该视角需要阐明的内容有:人类交往和社会过程的特征、社会结构的符号性和社会成员构建社会符号的语言过程。在此基础上,Hodge & Kress(1988: vii-viii)归纳出用以指导阐

释多语式语篇的两个理论前提:

1) 社会层面是理解话语结构和过程的首要前提,也就是把社会结构和过程当作出发点来分析意义。从该前提出发,仅关注语词是不够的,因为意义不仅存在于语言系统,也存在于其他符号体系。

2) 语言理论必须看作是社会实践的诸多符号理论的一种,因为多语式是语篇的内在本质。如果单种语码不与其他符号体系相联系就得不到充分的理解。

在实际分析中,社会符号学注重语篇的成文性、社会起源和生产以及解读三个方面(Kress et al. 1997: 258-259)。这三个方面与下面要阐释的交流的三个条件相对应。

正如 van Dijk(1983)所指出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为所分析的话语类型提供一个总的描述“语法”。社会符号学从不同的学科中采其所长,综合不同语式的作用,目的就在于为理解视觉化语篇提供这种“语法”。故而,这种解读一是致力于分析特定语

篇得以实现的主要表征语式;二是理解任一符号语式在产生意义方面所具有的文化和历史潜势。于是,以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为蓝本,社会符号学(Kress et al. 1997: 261)确立了阐释多语式语篇的总体框架或称为交流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

- 1) 必须是表征和交流与参与者社会关系相关的方面;
- 2) 必须是交流和表征交流者希望交流的事件、事态(states of affairs)和知觉;
- 3) 讯息生产(the production of messages)必须具有粘联性,也就是语篇不但要有自身内部的粘联,而且得与语境之间有粘联性。

从超文本的层面来看,第一个条件就是解读浏览者与图像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个条件主要是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超文本中所表达的事态;第三个条件则与超文本的视觉空间的社会符号学阐释相关。就视觉语篇而言,第三个条件的进一步细化可体现为下述的信息价值、突出度和分格(framing)。

#### 4. 信息价值、突出度和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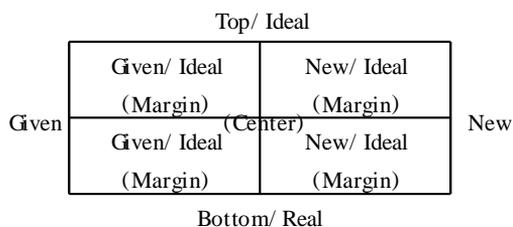
Kress & Leeuwen (1996: 183)指出,任何多语式语篇都不是任意组合的产物,必须遵循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则:信息价值、突出度和分格。在视觉语篇中,不同的位置无疑具有不同的价值。

信息价值就指各种成份占据不同的位置从而拥有不同的价值。位置可以是:左右、上下、中心与边缘。

突出度可理解为各种成份,由于它们在前景或背景中位置、大小、亮度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引起读者不同程度的注意。

分格指分格手段的明用或暗用,用来切断或联接语篇的成份,表明这些成份是相连或不相连。分格的意义在于“不相连的成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是与总体分离或独立的,甚至可能是作为对立的意义单位;而相连的成份在某种意义上则可以解读为是相近的、连续的或互补的”(Kress & Leeuwen 2001: 2)。

为了判断视觉成份的信息价值的轻重,Kress & Leeuwen (1996:208)认为,我们可依据从左到右和从上至下的阅读习惯,把页面分为四个象限(见下图):



Given 指已知的事实和条件;New 指新信息。实际上,信息是已知的或可预测的与新的或不可预测的之间的张力(Halliday 1994/ 2000: 296),并对应于左右位置之分。左边是起点,是“什么被认为是”,“假定是如此”等;右边则是终点,具有“什么是新信息”,“情况如何”等。

“Ideal”和“Real”在这里并不拥有特定的意思,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赋值的概念。所以,Ideal 可以是时间上的距离,也可以是某种愿望或理想;而 Real 的含义则是“此时此地”,“经验上是如此”等。

据 Kress et al. (1997:275)的看法,左右和上下在视觉空间的排列是固定的,至于这四个象限内的内容则要根据不同文化与网站的群体利益来决定,但上下左右的分界意义却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左下方的内容肯定是“Given/ Real”。上下的区分是与本体判断相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而左右之分则与信息状态相联系。除上述排列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排列法。方法之二是中心与边缘之分。根据该方法,中央位置具有主导作用,所以排列“主要信息”;边缘意味着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于是放置着“不太重要的信息”。方法之三则是前两种的混合。显然,上述三种排列法都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

下面我们以交流的第三个条件(即信息价值、突出度和分格)为起点,对超文本作实例分析,从而验证上述框架是否适合分析汉语超文本,并针对不同的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 5. 实例分析

例 1 和例 2 仅是网页的上半部。由于是网站的主页,这两例拥有该网站几乎所有的内容,信息量也最为密集。每种成份在视觉空间的位置是通过下述方式得到体现的。首先是通过索引(如例 1 中栏目正上方从左至右的位置):“新闻中心、时政、国际、地方、科技、IT”等;其次是通过主题,如例 1 左边的“中国人大新闻”、“体育在线”、“人民书城”,以及整个页面的所有标题。标题使用不同的颜色、大小不同的字体来体现它们的突出度。

在突出度方面,例 1 顶端的动态文字“共享世纪阳光,提升竞争力量”和位于例 2 相同位置的广告都是用以推销某种产品或倡导某种高雅的活动。同时,也由于它们在网页中所占的位置,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商品或活动是“理想化”的事物,只有少数人或家庭才能消费得了,这正是话语商业化或市场化的体现。话语商业化还体现在例 1 右上方占据重要位置的“短信、订

闻、传情、图片”等索引。比如,在这些索引的正下方,有“订头条:把握非典动态”的标题,属于“广告”范畴。它在传递非典最新信息的同时,也在利用人们关心事态发展的心理,进行一种“商业往来”。例1右下方的“公告栏”与这些索引相比,位置(因为在右下方)显然并不那么重要。并且,更有趣的是,这“公告栏”与它正上方的栏目之间具有相当距离的空白分格。这里的空白可能拥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之一是在暗示我们,如果你需要做广告,请与网站联系,还余下不少空间。

就分格而言,例1和例2都具有分明的界线。不同的栏目有自身的分格线,主题之间的间隔明显。但我们认为,分格是与局部粘联相对的。仅当所有的分格被超越,整个网页的粘联才能成立。这种粘联与其说是文本的内在本质,不如说是读者的理解方式,因为意义建构者是读者而不是设计者,话语分析者也属于读

者,只不过是更为“挑剔”的读者罢了。

在本文的两个例子中,左右的位置分布和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分布在人民网具有极为不同的价值。整个栏目的编排似乎符合 Kress & Leeuwen (1996)的划分法,但从左至右的第三个栏目却占据了中央的位置。这说明,该栏目是所有栏目的重中之重。中心与上方位置,在这两例中,也就最具信息价值,左右之分则显得不太重要。当然,如前所述,这还得取决于不同的文化以及设计者自身的素质。但不难看出,例1中的动态图片“曼纳落幕”与右边上方的“短信、订约、传情、图片”两个栏目损坏了整个页面的粘联效果和成文性,因为它们与前后左右的内容并不“兼容”,即被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这好像违背了上述第三个交流条件:语篇自身的粘联性。

## 例2.



(2003年6月10日拷贝)

但本文认为,例1从下述角度来考虑又是粘联的整体。

在九十年代初期,媒体已将政治与商业十分微妙地结合起来,不言而喻的原因在于凡是媒体就必须拥有受众。或许人们会认为政治媒体与商业压力无关,然而,事实却是政治媒体与商业媒体在相互争夺受众。也就是说,当今的主要媒体不仅把听众或观众当作公民,同时也把他们当作消费者。于是,形成了一个以信

息(informat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为类型的文化和政治的连续体,可称为“信(息)娱(乐)”(infotainment),或上述的“话语商业化”。虽然人民网为官方网站,但是,它一方面得注重新闻的轻重之分,如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地方事件、周边事态等信息顺序;另一方面,它又得考虑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关心所有的内容。不管是例1还是例2都明显体现了这种复杂性。Jameson(1991)称这种复杂性为后现

代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在话语中表现为杂语性(hybridisation),也是后现代话语的准则(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93)。换句话说,它是高雅与媚俗、崇高与低下、伟大与平凡等相结合的产物。

交流的第二个条件需要我们阐释表征世界的事态。从表意功能的角度来说,任何符号体系,不管是在指称还是假拟指称的意义上,都必须表现自身体系之外的经验世界,哪怕这个经验世界有时可能是其它符号体系。在图像中,就像行为可用行为动词来表示一样,两客体的交往关系是由“向量”(vector)来直观表达的;而语言中由地点介词所表述的内容,在图像中则是通过前景与背景之间的对比来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中可表达的,在图像中也都有相应的手段,反之亦然。与语言相仿,图像拥有的意义潜势同样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从文字的发展史来看,Kress等以文字来推断图像显然不符合史实,因为至少汉字是起源于图像的(唐兰 1949/2001:55),而作为理解当代多语式语篇的入门还是可行的。

于是,对例1中央的动态图片我们可作如下分析。在该图片中,手捧“金棕榈”奖的动作者面对的是电脑前的浏览者,其动作的方向(即向量)不是观众,而是他双手托起的“金棕榈”奖;动作者的目光是对着浏览者,与浏览者之间似乎形成了Kress & Leeuwen(1996:61-67)所说的“交易结构”(transactional structure)。然而,真正的向量是沿着动作者的双臂,特别是右手臂的方向,指向“金棕榈”奖。于是,浏览者的目光被引向占据突出位置的“金棕榈”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关系。与之相对,例2中占据相同位置的图片不存在向量关系,它仅叙述一个事件,是非交易结构(non-transactional structure)。

交流的第一个条件则要求我们解读超文本和浏览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组成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有:社会距离、态度关系和社会权势。根据社会符号学理论,社会距离可由表征成份的大小来表明,也就是被表征成份与读者的距离;态度关系由观察者的水平位置与成份的关系来判断(如“正面”、“侧面”、“边缘”等);权势关系则由观察者与客体的垂直关系来体现。如果客体比浏览者更具权势,浏览者需要仰望它(如例2中的“金棕榈”奖),否则,可平视或俯视它。

这里令读者感兴趣的是,位于页面正中央上方属于“Ideal”范畴的内容,在社会距离方面,离读者较远,而且,标题字体越大,它所涉及的内容就越是远离浏览者。当然,这也需要考虑不同读者群的社会定位。

以上是依据交流的三大条件所做的分析,但这里

有必要强调超文本的动态和虚拟特征。

例1、例2是不同时间拷贝的相同日期的网页,拥有三个内容不固定的动态区域,这使得整体网页都处在变化之中。对照例1、例2中的文字标题,我们发现,例1中第三栏目从上至下的第三个原标题“大雾中乌克兰客机撞山……”已占据了例1中原“戛纳落幕……”的位置。例1中的“短信、订阅、传情”等内容在例2中已不复存在。超文本的这种虚拟性和动态性说明了它与其他文本的差异和复杂性,这是迄今为止社会符号学尚未正面对待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 6. 结语

网络话语能为话语分析所重视的方面是多维的。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就认为,话语分析还应包括评估后现代话语对社会控制和文化民主化等方面所产生的似是而非的影响。Luke(1991:1)指出:“在尚处于不断发展的跨国消费社团中,常规语码的权势、意识形态以及抵制方式都在变革之中,但却是以不明确的、甚至是自相矛盾或不完全的方式变化着。在这些跨国消费社团中,物流、服务流以及符号,生成高密度编码的‘超现实’或‘超媒介’,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意识的新区域和场所。权势和意识形态在这些区域和场所中总是隐蔽地运作着。是谁的权势?谁的意识形态?”

社会符号学所做出的努力可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尽管这门学科仅仅是阐释话语的一个视角,但对综合理解语篇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

## 参考文献

- Chouliaraki, L. & N. Fairclough.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ope, B. & M. Kalantzis (eds.). 2000. *Multiliteracies: Literacy Learning and the Design of Social Future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6. Technologicalisation of discourse [A].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81.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M]. M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Foucault, M. 1984. The order of discourse [A]. In M. J.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C].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78/2001.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London: Edward Arnol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94/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Beijing: Edward Arnol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89.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Oxford: OUP.
- Hodge, R. & G. Kress. 1988. *Social Semiotic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ress, G. 2000a. Desig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theories of meaning [A]. In B. Cope & M. Kalantzis (eds.). 2000.
- Kress, G. 2000b. Multimodality [A]. In B. Cope & M. Kalantzis (eds.). 2000.
- Kress, G. & T. van Leeuwen.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ress, G. & T. van Leeuwen. 1998. Front pages: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newspaper layout [A]. In A. Bell & P.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C]. Times New Roman.
- Kress, G. & T. van Leeuwen.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Arnold.
- Kress, G., R. Leite-Garcia & T. van Leeuwen. 1997. Discourse semiotics [A].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 1* [C]. London: SAGE.
- Luke, T. W. 1991. Touring hyperreality: Critical theory confronts informational society [A]. In P. Wexler (ed.). *Critical Theory Now* [C].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Oren, T., G. Salomon, K. Kreitman & A. Don. 1990. Guides: Characterizing the interface [A]. In B. Laurel (ed.). *The Art of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C].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Ramarapu, N. K., M. N. Frolick, R. B. Wilkes & J. C. Wetherbe. 1999. The emergence of hypertext and problem solv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ccessing and using information from linear versus nonlinear systems [A]. In K. E. Kendall (ed.).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mproving Decisions, Cooper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 Thousand Oaks: SAGE.
- The New London Group. 2000.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 [A]. In B. Cope & M. Kalantzis (eds.). 2000.
- van Dijk, T. A.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o the structure of new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20-43.
- 唐 兰, 1949/2002, 《中国文字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03—6—24;

修改稿, 2005—10—13;

本刊修订稿, 2006—9—13

通讯地址: 100044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p. 428

The study combines the B-L model and Culpeper's theory of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Hampton's *The Philanthropist*. It demonstrates the advantages of synthesizing the two theoretical models in the stylistic analysis of drama. Compared with Abdeslem's analysis of the same dramatic text based solely on the B-L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into account readers'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reveals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dramatic conflict in a more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mann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also makes some modifica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s involved.

**A social semiotic analysis of hypertext's multimodality**, by YE Qic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Jiaotong Univ., Beijing 100089, P. R. China), p. 437

The analysis includes a social semiotic account of multimodal texts, the division of the visual spa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es of affairs in the represented world as well a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viewer and the image.

**A review of current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 by HAN Baoche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 Beijing 100089, P. R. China), p. 443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ost influential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 including the ILR (FSI) scales, the ACTFL scales, the ISLPR scales, the ALTE scales,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and the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ach of these scales are discuss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n English yardstick for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is proposed.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aptitude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DAI Yunc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Forestry Univ., Linhai 311300, P. R. China), p. 451

This paper i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aptitude and related factors on L2 acquisition by English learners at the tertiary level in Chinese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guage aptitude is correlated with L2 acquisition and the gender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not with their learning strategy,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language aptitude between freshmen and juniors is indicated. In addition, it is argued that language aptitude has correlation with gender and remains stable at the tertiary level. Language aptitude can affect L2 acquisition independently as well as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gender.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glish writing strategies, cognitive processes of writing in TEM-8 and achievement**, by XIU Xudong & XIAO Defa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Ludong Univ., Yantai 264025, P. R. China), p. 460

An investigation of 463 seniors from 3 universities shows: 1) both learning strategies (in writing) and process strategies (in writing) have direct effects on the writing processes in TEM-8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writing performance and total scores; 2) "Presenting Strategy" has a variety of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ub-cognitive processes; 3) writing performance and total scores can be positively accounted for, to a great extent, by "Organizing" and "Presenting" in the sub-cognitive processes.

**Translation testing and grading**, by MU Lei (School of Interpreting &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P. R. China), p. 466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major translation testing methods and marking scales used in text-based translation testing, and discusses their inadequacies. Some are too subjective, some are inflexible in error-counting grading, some lack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and some do not suit large-scale testing especially when more than two markers are involved.